



妇好墓玉器的发现与研究*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the Jades from the Fu Hao Tomb

翟少冬

Zhai Shaodong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ASS, Beijing, 100710)

内容提要: 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的一座殷墟大中型墓葬。本文梳理了妇好墓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妇好墓的重要考古发现、妇好身份的研究, 并对妇好墓出土玉器的数量、种类及其玉料、工艺、风格、文化归属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做了综述。妇好墓的发现与研究为研究商代贵族的墓葬形制、丧葬制度、礼乐制度、社会发展、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其出土的玉器也是我国单个墓葬出土玉器之最, 为研究商代的制玉工艺、用玉制度、玉器功能、玉器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关键词: 妇好墓 玉器 棺槨

Abstract: Fu Hao Tomb is a large and middle-sized burial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grave goods found at the Yin Ruins so far.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its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its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the research on the identity of Fu Hao,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to the quantity, types, material, technology, character, culture affiliation of unearthed jades as well.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n Fu Hao Tomb supply rich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shape and structure of the elite's tombs, burial system, ritual system,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raft production during the Shang Dynasty. The jades unearthed from this tomb has a much larger number than those from any other single tomb, and provides precious information for studying jade production technology, jade usage system, jade function, jade culture and so on.

Key Words: Fu Hao Tomb; jades; inner and outer coffin

妇好墓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是殷墟出土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商代王室墓葬, 随葬品种类齐全, 工艺精湛。尤其是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 为商代玉器的研究提供了空前的资料。

一、妇好墓的发现和发掘^[1]

妇好墓的发现是个意外。1975年冬, 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 平整土地, 妇好墓所在的河南安阳

*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 16BKG003)、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研究成果。



小屯村西北是个岗地，自然也成为平整的对象。然而，这一地带虽然是殷墟的宫殿宗庙区，是重点保护区，但从未进行过发掘。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破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站的同志们在郑振香先生的带领下对这一片岗地进行钻探。

开始是对岗地四周的钻探和发掘，对发现的夯土进行钻探是在1976年5月进行的。工作开始进展得很顺利，很快探到了耕土层下殷文化层内密集的夯土建筑基址，这个重要的钻探发现使得该处岗地被保护下来，免于平整。但是这片岗地距小屯村较近，不利于长期保护。安阳考古工作站决定对该处岗地进行发掘，重点是建筑基址。一座南端被取土破坏的残房基的剖面显示，其下还有长方形夯土，较房基土坚硬且厚，根据周边断崖上的剖面初步判断是墓葬。于是通过钻探来进一步确认。钻探的过程是艰辛的，前后进行了一天多的时间。一杆3.5米探不到底，便下挖3米，然后接杆加拧杆继续下探，在距地表6米时，夯土变成软泥，钻探工作变得更加费劲，吃力地下探到7米时，探杆突然迅速下坠了1.2米，人们的心提了起来。接着就感觉探杆触到底部了，小心翼翼地将探铲提上来，发现铲内满是鲜艳的红漆皮。人人脸上露出了兴奋和喜悦的笑容，一致确定这里是墓葬。这是一个意外，也是一个惊喜，在宫殿区出现墓葬，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发掘工作在钻探结束之后立刻进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清理墓内的填土，第二阶段是水下操作，历时半个多月。发掘结果显示，妇好墓（M5）是座长方形的竖穴墓，墓口距地表0.5米，被压在房基F1下。墓口南北长5.6、东西宽4、深7.5米，其中水下部分1.3米。在距墓口6.2米的東西两壁中部各有一个长条形壁龛，两龛内都埋有殉人。在与壁龛底部等高的四壁有经过夯打的熟土二层台，宽约0.3、高约1.3米。南壁二层台上有组成椁盖的原木数根，椁室在水下。基底中部偏南还有一个腰坑，长约1.2、宽0.8、深约1米。腰坑中发现殉人一具和殉狗一只。

二、妇好墓的重要考古发现

妇好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贵族墓葬。对它的发掘完整地揭示了其墓葬形制特点和随葬品情况。

妇好墓内有棺有椁，但都在水下，而且大部分已经腐朽。发掘时抽掉基底的水后发现，椁盖上的原木基本由南向北排列，东西与二层台相接。在椁木上发现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发掘者认为是椁盖上的覆盖物。椁板用平整的木板构成。椁的尺寸大致为长5、宽3.4—3.6、高1.3米。棺在椁的中部偏南，大小和结构不明。从一个残片来看，其上有经过多次髹漆的漆皮，漆皮上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之上有一层薄绢，相当考究。

墓内共发现殉人16具。其中椁顶上层4具，分别分布在墓室的西北、北和东北部；壁龛内3具，2具在东壁龛，1具在西壁龛；1具在腰坑；另外8具分别从椁内棺外的南端和西端的泥浆中捞出。16具殉人中包括男性4具，女性2具，儿童2具，其余不可辨。除殉人外还发现殉狗6只，1只在腰坑，其余5只均在椁顶上层，和椁顶的4具殉人在一个平面上。

另外，如上所述，发现妇好墓时，其墓圻之上叠压着F1的基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这个房址和墓葬可能同时，发掘者认为可能是墓葬修好后在其上为祭祀妇好专门修建的享堂。房基呈长方形，转角略圆，稍大于墓口，南端被断崖切去，南北残长5.5、东西宽约5米。东西向，门道向东。房基面上有柱洞，房基外侧东西北三面有夯土打成的擎檐柱的柱基。房基为挖“槽”而建，大小与妇好墓大体接近。杨鸿勋先生曾对此建筑进行复原^[2]。

妇好墓出土的随葬品数量众多，共计1928件，包括铜器468件（未计小铜泡），占随葬品总数的24.3%；玉器755件（未计少量残片和有孔小圆片），占随葬品总数的39.2%，石器63件，宝石制品47件，骨器564件（未计残碎过甚的笄头），占随葬品总数的29.3%，象牙器皿3件及残片2件，陶器11件，蚌器15件。另外还有红螺2件，阿拉伯绶贝1



件，货贝6820余个。

随葬品主要发现于妇好墓的5个位置。一是墓室填土中，在由上而下的六层填土中均发现有随葬品，尤以第6层填土中的随葬品数量最多，仅骨笄和象牙器皿就80余件；二是椁顶上层，与墓葬的殉人殉狗同层；三是椁顶，出土5件器物；四是椁内棺外，大型青铜礼器大部分出于靠近木椁的东、西、北三面，其中北面的都是大型重器，带有“妇好”铭文的器物放在最显著的位置；五是棺内，主要是玉器和海贝。

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共468件，另外还有上千件铜泡，重量共计约1.6吨，以礼器和武器为主。其中礼器210件，且大多放置在棺椁之间，类型较全，有炊煮器、食器、酒器、水器等，多成对成组出现，以成对的为最多。青铜武器有134件，其中有2件大铜钺，均带有“妇好”铭文，分别重9和8.5千克。另外还有工具、杂器、乐器。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包括了殷墟出土的所有青铜器造型。

妇好出土的器物中有很多带有铭文。据统计，带有铭文的器物共190件，铭文有9种，以“妇好”铭文最多，共111件，为判断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从青铜礼器来看，铭文不同，陈放位置不同。带有“妇好”或“好”铭文的铜器基本陈放于椁内棺外的北面和东、西两面的显眼位置，带有“司母辛”、“司母戊”和“亚弼”铭文的青铜器放在东、西、北三面的角落中，而带有“子束泉”铭文的铜器则置于椁顶。

椁内棺外大型青铜器的陈放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的陈放位置大致是：北面的由东向西依次为司母辛大方鼎，鼎下压大石磬一件；妇好三联甗，其下有铜觚十余件；“好”大型连体甗；“好”大铜盂；亚弼大圆鼎。东面的从北向南依次为，后母戊大方尊两件，南北并列；妇好方罍，罍东侧放圈足觥一件；妇好鸮尊两件，南北并列；妇好扁圆壶；司母戊方壶两件，亦南北并列；方壶西侧有石鸮鹑一件。西面的从北向南依次为司母辛大方鼎；妇好方尊；妇好方罍

两件，东西并列；妇好偶方彝；司母戊圆尊两件，南北并列；圆罍三件，由北向南排列，南北两端的为“司母戊”铭；中间一件为“其”字铭。

根据妇好墓出土随葬品的形制特征、墓葬层位关系分析，发掘者认为此墓的年代属于殷墟文化第二期。

三、妇好其人

殷墟M5因为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上有铭文“妇好”，而被大多数学者认为墓主人是妇好。妇好其人，殷墟第一期（武丁时期）甲骨文和第四期（武乙、文丁时期）甲骨文中都有记载，因此对于此墓主人的身份学界曾有争论^[3]。有人认为是武丁的配偶，有人认为是康丁的配偶，还有人认为第一期甲骨和第四期甲骨中提到的妇好是同一人。但对照甲骨文中的记载和该墓的情况，大部分学者同意该墓主妇好为商王武丁的第一位王后，死于武丁在位后期，名“好”，庙号“辛”。甲骨文中记载武丁为妇好占卜征战、生育、疾病以及去世后状况等卜辞二百多条。这些卜辞内容说明，妇好生前是一位能征善战、地位显赫、深受武丁宠爱的王妃。甲骨文中记载妇好的事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4]。

1. 率兵征战的将军

甲骨文记载妇好在武丁开疆拓土的事业中功勋卓著，曾为武丁征集兵员，并带兵参与征伐北方的土方、西方的羌方、东方的夷方和西南的巴方，并在对羌的战斗中统帅1.3万人作战，显示了妇好极强的领兵作战能力。

2. 主持祭祀的贵族

妇好不仅以王室成员的身份参加祭祀大典，而且主持祭祀仪式。据甲骨文记载，妇好主持过侑祭、根祭、卣祭、伐祭、宾祭等，也曾主持过祭祀先妣的仪式。祭祀时屠杀俘虏、人牲，用牛和酒。妇好还做过卜官。甲骨文中记载有妇好曾整治



5个龟甲，留作占卜时用。说明妇好是一位显赫的贵族。

3. 拥有封地的郡主

妇好可能曾像商朝的其他贵族功臣一样，在王都之外拥有封地，并且时常觐见商王，定期向王室进贡。甲骨文中有武丁占卜妇好是否回安阳、什么时间回的记录，还有令妇好回到安阳后觐见的记载。此外，还有武丁令妇好到异地觐见，以及和其他妃嫔相聚的记载。妇好还曾一次进贡甲龟50个，另一次贡入甲龟5个。

4. 深受宠爱的王妃

武丁对妇好十分关心，甲骨文中大量记载武丁为妇好生育、健康状况、生死疾病占卜的卜辞。卜辞记载不仅占卜妇好是否怀孕、婴儿的性别、预产期，而且还为妇好祈福，请求先祖为妇好祛除灾祸，保佑妇好腹中小生命健康。另外，做梦、鼻疾、腹疾等也是武丁为妇好占卜的内容。在妇好去世后，武丁还为她举行各种祭祀，先后三次将妇好许配给上帝或祖先做“冥妇”，以期妇好能够得到祖先的福佑。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武丁对妇好的宠爱。

四、妇好墓出土玉石器及相关研究

妇好墓共出土玉器755件（一些穿孔玉髓小圆片及玉器残片未计入），是商代出土玉器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墓葬。妇好墓玉器种类齐全，以装饰品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礼器、工具、仪仗器，生活用器比较少。

玉器发现时主要位于棺内，大部分完整或稍有残缺，发掘时棺椁位于水面以下，因此玉器主要从水中取出，具体陈放位置不明。但粗略可知佩戴玉饰大多处于棺内中部，玉人位于腰坑东侧的中部，玉戈多出于棺内北端，璧、环、瑗等礼器出于棺内四周。棺内西侧近腰坑处有刻刀、玉鱼等，出土时，玉器上沾满了红色漆皮或朱砂。

玉器的色泽以绿色为主，有墨绿、茶绿、黄

绿、淡绿等；黄褐色与棕褐色的次之；白色、灰色和黄色的很少；黑色的只有4件。

1. 妇好墓出土的玉器

礼器175件，约占出土玉器总数的23.2%，器形有琮、璧、璇玑、环、瑗、璜、玦、簠、盘等9种，其中璜的数量最多，共73件；环次之，共24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玉礼器除璋外，这里基本齐全。

仪仗器54件，约占7.2%，有戈、矛、戚、钺和大刀。一般无实用痕迹，大多雕琢精致。戈的数量最多，有39件，较大的几件正反面都琢出阳纹脊线 and 对称的边刃，工艺水平相当高。其中一件大刀两面均雕刻极为精致的龙纹，是珍贵的艺术品。

工具74件，约占9.8%，有斧、凿、镑、锯、各种刀类、弯锥形器、纺轮、铲、镰等。其中锯、镰及部分小刀有使用痕迹，可能是实用器，而斧、凿、镑及部分小刀、铲无使用痕迹，大概是象征性的。刀的种类很多，有小刀、刮刀、梯形刀及小刻刀，大多小巧玲珑，并有精细的刻纹，是难得的艺术品。出土的刻刀有23件，绝大多数柄端雕成各种动物形象，大致有夔、鸟、鱼、壁虎等，多为浮雕，两面刻纹，以鱼形最多，鸟形次之。多数在动物尾端刻出刀刃。刻刀柄端多有小孔，可佩戴，既是小型艺术品，又可实用。

装饰品426件，约占出土玉器总数的56.4%；品种相当复杂，大致有用作佩戴或镶嵌的饰物、用作头饰的笄、臂饰类的镯形器、衣服或器物上的坠饰、佩戴的串珠、圆箍形饰和杂饰等7种。此外，还有一部分用途不明的饰物和少量的动物形玉雕，上面既无可供佩戴的孔眼也无可供镶嵌的榫，可能是玩赏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包括玉人、龙凤与怪鸟怪兽、各种动物，这些动物形象的玉雕有155件，包括兽畜类的虎、象、熊、猴、鹿、马、牛、狗、兔、羊头和兽头等；禽鸟类的鹤、鹰、鸱鸢、鸛、鸱、鸢、燕雏、鸟、鸬鹚、鹅等；鱼类；两栖类的蛙；爬虫类的鳖；昆虫类的蝉和螳螂。大多采用写实的手法，形象逼真。



另外有生活用具9件，杂器17件。有研磨朱砂的臼、杵、调色盘、梳、耳勺、匕等。大都为实用器。

2. 妇好墓出土的石器和宝器

除了玉器外，妇好墓还出土了一些石器和宝器。石器共63件，按照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乐器、工具、各种动物形雕品、装饰品以及杂器6类。其中礼器12件，有豆、盂、甗、觶、壘、壶形器、罐、器盖等；乐器5件，都是石磬，2小3大，2件小石磬出土于墓室填土中，3件大石磬出土于椁内；工具18件，有铲、锤、杵和磨石四种，以磨石数量最多；动物形石雕15件，有牛、熊、虎、鸛、鸟、怪鸟和蝉等；装饰品有珠和柄形饰两种；杂器有石球和管状器。

妇好墓出土宝石包括绿晶、玛瑙、绿松石和孔雀石4种，共47件，按照用途可分为装饰品、艺术品及其他3类。装饰品主要是珠子，艺术品有虎、鸽、龟、蝉等动物形雕，其他有箍形器、坠料和贝3种。

3. 妇好墓玉器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界对妇好墓玉石器大致从玉料、器物风格用途和文化归属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玉料 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对妇好墓出土约300件玉器进行玉料鉴定后认为，妇好墓玉器的玉料基本上是新疆玉，有3件近似岫岩玉，1件为独山玉，玉料的产地大多为新疆和阗一带的河谷。石器的石料经鉴定大致有大理岩、石灰岩、泥质灰岩、砂岩、泥质砂岩、碳酸盐岩、石髓以及蛋白石等。大理岩多用作礼器和动物形雕品，石灰岩及泥质灰岩多用作磬和工具，砂岩都用作磨石，石髓则全被雕成小圆珠^[5]。

张培善曾对妇好墓出土的一些玉石碎片和少量的残器进行化学全分析、矿物X射线粉晶测定和薄片，提出妇好墓出土的玉器的原料多为透闪石软玉，莫氏硬度大约为6，玉石颜色各异的原因与地质时期成岩作用时混入的杂质有关^[6]。

申斌对缅甸玉、新疆和田玉、辽宁岫岩玉、南阳独山玉和东陵石等产地不同的玉石进行化学微量元素分析，通过和妇好墓出土的部分玉器的化学分

析结果进行比照后提出，妇好墓玉器的玉料和新疆和田玉极为接近，与南阳玉毫无共同之处，与缅甸玉、岫岩玉、东陵石的差别也很大^[7]。

（2）工艺 陈志达在对妇好墓玉器进行观察后提出，妇好墓玉器的制作工艺有如下特点^[8]：

第一，使用了阴线刻、阳线刻、镂空、钻孔（管钻、桎钻）、浮雕、圆雕、俏色、抛光等技法，也已经开始使用砣子之类的工具。

第二，在选料和用料上经过缜密考虑，善于利用玉料的自然形态，设计出比较切合的题材，如1件伏卧回首的玉牛，就是利用玉料前高后低的自然形态设计而成。也利用残器改制他器或利用较大的钻芯制成合适的器物，如玉纺轮就是利用环、璧之类的中心部位管钻下来的钻芯制成的。

第三，按图雕纹，也就是说纹饰可能有设计图。因为多数浮雕的兽和禽鸟，各自两面的花纹基本相同，仅少数在局部有小的差异。

（3）器物风格用途 夏鼐先生根据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对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进行了研究，为玉器的分类和定名提供了参考^[9]。

刘桓根据文献提出妇好墓出土的圆雕玉人身上的柄形器为插在玉人腰间的一件器物，应是与玉人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玉器“珽”（帝王所持的玉笏称为搢，插于腰间）或“茶”（诸侯所用的玉板）^[10]。

曹楠对三代的柄形玉器的特征、用途等进行了研究，提出妇好墓的柄形玉器多以小型为主，大型的少见，钻孔一般只发现在大型柄形玉器上，大型柄形玉器可能为仪仗用具^[11]。

李凡对妇好墓出土的动物形玉器进行了分类，并对各类进行了归纳、统计和分析，进而总结了妇好墓动物玉器的总体风格、特征及相关问题^[12]。

（4）文化归属 吕建昌在比较了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和石家河晚期文化出土的玉凤后提出，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并非商代旧物，而是由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楚民族所创造。妇好墓玉凤可能是殷商时先楚民族纳给商王朝的贡品^[13]。

妇好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出土随葬品最多的殷墟大中型墓葬，对于研究商代贵族的墓葬形制、丧葬制



度、礼乐制度、社会发展、手工业生产等情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出土玉器的数量也是我国单个墓葬最多的，为研究商代的制玉工艺、用玉制度、玉器功能、玉器文化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注释

[1] 本文所述的有关妇好墓的发现、发掘和随葬品情况的内容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杨鸿勋：《妇好墓上“母辛宗”建筑复原》，《文物》1988年第6期。

[3] 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曹定云：《“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中原文物》1993年第3期；郑慧生：《妇好论》，《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张素凤、卜师霞：《也谈“妇好墓”》，《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韩江苏：《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中原文物》2010年第1期。

[4] 王宇信、张永山、杨升南：《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妇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6] 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

[7] 申斌：《“妇好墓”玉器材料探源》，《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8] 陈志达：《殷墟玉器的工艺考察》，《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323—353页。

[9] 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

[10] 刘桓：《殷墟妇好墓圆雕玉人柄形器的文献解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11日第5版。

[11] 曹楠：《三代时期出土柄形玉器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

[12] 李凡：《殷墟妇好墓写实动物形玉器初探》，《经济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

[13] 吕建昌：《关于殷墟妇好墓玉凤的归属问题——兼谈楚文化的渊源》，《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